

# 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开采之害及其地方应对

## ——兼论风俗信仰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钱克金<sup>\*</sup>

【摘要】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发生了一系列开采的祸害,这些开采往往冠以修建海塘、桥梁、铸币等名目,师出有名,实际多为假公济私之举。然而地方县令在有识之士的积极配合下,始终能顶着各种压力,厉行禁止,为地方环境保护做出了应有贡献。通过对相关禁文及其他保护措施细致分析,我们清楚可见风俗信仰与心系民生是这些为官者极力保护环境的主要动因。而今同样存有类似风俗禁忌,如果我们能有针对性地因势利导,不仅可以破除糟粕迷信的危害,亦能推陈出新地加以健康利用,不失为保护环境的良策。

【关键词】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开采的祸害;环境保护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开采业无疑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化工行业相比,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根本原因是它主要发生在农村,而化工工业相对集中于城市;且引发的问题亦没有后者直接。其实开采业所带来的后果同样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每一道青山即是一座活水库,我们祖先之所以“山川”连称,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人类的聚落无一不依水而建,更何况工农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日增。过去我们只注重林木毁坏的灾害,其实开山的恶果更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于平陆大规模开采,因地下水的大量抽取亦同样引发连锁的后果。再者,开采业投入低获利高,自然诱使人们趋之若鹜,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相对削弱了合理的生产、制造和创新产业,造成了经济的恶性发展。这一问题的引发,既有当今世界大环境的背景,也有历史的根源。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 J. 唐纳德·休斯对此有过很好的反省性研究,他认为:20 世纪下半叶,大部分世界历史研究将“发展”作为其叙述主题,并用它来解释历史的进程,以致在今天广为接受的历史观念中,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成了发展的要义,“发展”本身成了目标;而这种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展,无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大大造成了生命群落的毁灭,因此其成就是靠不住的。

<sup>\*</sup> 历史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313000。本文是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5110186)的研究成果。

在环境史的意义上,发展的主要意义并不是艺术和科学上的改进,而是更健康、更丰富的环境,或者是更可靠、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sup>①</sup>而英国威廉·贝纳特亦道:“环境变迁的进程深深植根于过去。对危机的感知和应对这些危机的尝试同属于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sup>②</sup>可见环境史无疑有助于修正我们错误的发展观,对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很好的启迪作用。以下着重从人文、社会二方面,初步探究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开采所酿成的祸害及时人用心良苦的应对,希冀为今天环境问题的解决起到推陈出新之功。

## 一、开采的历史诱因

湖州“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士大夫趋之若鹜。早在南朝时,今德清武康境内的优美山水就已孕育了浓郁的人文景象。南朝梁代包明月的《前溪曲》即是写照,“忧思出门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多舍故。为家不作井,担瓶下前溪。开穿乱漫下,但闻林鸟啼。逍遥独桑头,北望东吴亭。黄瓜被山侧,春风感郎情。黄葛生烂漫,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黄葛结蒙笼,生在洛溪边。花落逐水去,何当顺流还。还亦不复鲜,逍遥独桑头。东北无广亲,黄瓜是小草。春风何足叹,忆汝涕交零。前溪沧浪映,通波澄渌清。声弦传不绝,千载寄汝名,永与天地并。”以故陈代刘删赋诗道:“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此后历代皆有歌山水、唱人文的诗篇,清代邑人唐靖亦歌咏道:“盈盈一带水,夹岸野人家。山鸟窥官舍,溪鱼送落花。云深樵作市,沙浅竹为槎。子夜今安在,犹将歌舞夸。”<sup>③</sup>真可谓是人类史上的良景。然而因物欲的驱使,明清时期,该区发生了一系列大肆开采祸害乡村的悲剧。就其祸端乃是有历史根源的。

湖州境内破坏山水的大规模开采,始作俑于西汉吴王刘濞,《太平寰宇记》记载:“武康山,在县(原武康县)西十五里,名铜官山。《舆地志》云:‘铜官山下有两坎,深数丈,方圆百丈,古采铜所。’”又谓:“铜官赵监庙。汉吴王濞凿山采铜,铜监赵氏遇山崩压死,降灵于此,后人立庙。”<sup>④</sup>从其遗留的矿坑,“深数丈,方圆百丈”,说明当时的开采规模非同小可,并造成了山崩,连主管开采的官吏都不免罹难,可见压死的人亦不在少数。尽管这一悲剧对后人有警示作用;但采矿冶铜可带来暴利,对后人亦是个诱惑。一旦此类世风再兴,自然有趋之若鹜之徒。此后虽沉寂一千余年无开采大祸,然至宋徽宗时,因大臣蔡京、朱勔之流,为取宠于皇帝,于太湖流域搜集奇花异石以进献,由此发展成为大规模搜集、成批运输的所谓“花石纲”。吴兴又遭开石之患,宋代周密有言:“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者。至宣和艮岳始兴大役,连舳辇致,不遗余力。……然工人特出于吴兴,谓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遗风。盖吴兴北连洞庭,多产花石,而卞山所出,类亦奇秀,故四方之为山者,皆于此中取之。”<sup>⑤</sup>由引文可知,致使湖州遭开采之害,乃是缘于汴京造艮岳之假山。对山水的破坏主要限于乌程县的卞山,同治《湖州府志》记道:“鲍珍《游石宕山小记》:‘石宕山,卞山之支。’附:明初筑县城,采石于此,山骨创残势,成湟窿。”<sup>⑥</sup>尽管引文说是明初筑县城,采石致使山残成湟窿,其实宋代开采才是主要祸首。而造成民生之害至深,“深山大泽,穷岸断谷,江湖危险,人迹所不可

①参见[美国]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译者序),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②[英国]威廉·贝纳特、彼得·科茨:《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包茂红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6月,前言。

③参见[清]疏篴等纂修《武康县志》卷三《地域志三》之《山川下·川》“前溪”,据道光九年刻本影印,1983年3月。

④[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87—1888页、第1889页。注:历史上今湖州德清县为二县,西为武康;东为德清。

⑤[宋]周密撰《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页。

⑥[清]宗源瀚等修、周学濬等纂《湖州府志》卷十九《舆地略·山上·长兴县》“石宕山”,据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1970年11月。

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胁州县，期于必取。……东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朱绅父子）肉。”<sup>①</sup>尽管民怨入髓，但其优良的石料亦声名远扬。其后杜绾撰《云林石谱》，不仅细数卞山之石的奇巧，还专论武康石的特殊用处。即“湖州西门外十五里，有卞山，在群（别本“郡”）山最为岬峯，顷朱先生居之，产石奇巧，罗布山间，巉岩礧礧，色类灵璧，而清润尤甚”；“湖州武康石出土中，一青色，一黄色而斑，……大抵石性匾侧，多濶道折叠势。浙中假山藉此为山脚石座，间有险怪尖锐者，即侧立为峰峦，颇胜青州”<sup>②</sup>。明清园林建造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期，尤其是太湖流域的私家园林，以故各类奇巧山石的市场需求颇为紧俏，而就近开采又便于运输销售。诸如明代中后期潘允端于上海所建之豫园，即以武康石为假山，其《豫园记》载：“累武康石为山，峻嶒秀润，颇惬观赏……。”<sup>③</sup>前文有关石料及“凿山采铜”的记载，无疑是起了引诱的作用；一旦朝廷有采石修塘、建城及开矿冶金等檄文的下达，逐利之徒将乘机蜂拥而至，这一系列因素诱发了明清时期湖州等地的开采之风。

## 二、祸害乡里的开采与官民的厉行禁止

人类为了生活的改善、生产的发展，筑路、造桥、建房及兴修水利等，必然要开采取料，为之所用；就是为了增加耕地，也免不了开垦。众所周知，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既然开采难免，但也得开之有方、采之有道；否则得不偿失，甚至会带来大灾大难。本文论述的即为后者，它并不属于人类正常之开采。搞清这一祸害的起因和影响，及时人的有效应对，对目前环境的治理将有所裨益。

纵观明清两朝，浙江湖州地区的开采主要发生于当时的武康和孝丰二县，即今德清县的西部和安吉的孝丰镇。其开采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所造成的危害非同一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对生态的破坏；再者是祸害乡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甚至引发大规模的聚众起事。

仅在明朝万历年间，浙东宁绍等地游民就聚集于武康县城东边的狮、虎两山，大肆开采，祸害乡村达二十余年之久。知县周宗建所飭《禁石宕文》即载：

万历四十三年，邑人骆从字等请禁，奉巡抚批，永不许开武康。僻邑人民穷苦，专藉农桑，生事死葬，俱在乡域，一坏之上，不越几步，数廛之氓，不离咫尺，兼之山壤，水旱不常，专恃沟渠，以为蓄泄。近自二十年来，县东一带，石山祸被，浙东游棍聚此采石，开凿骚然。始犹取麓，渐至山腰，沿袭既久，遂侵及顶。此皆宁绍游民，鼠聚此中，稍出微资，各相租佃，既佃之后，山无定额办粮，亩许侵至十倍。各据山头，广招石匠，斤樵斧伐，日夕无休，县治逼近诸山，剥落将尽。历年以来，累经三院，明刊告示，勒石示碑，禁止甚严，而日久延缓，数禁数犯，高山之顶，变成深坑，秀削之峰，夷为平址。究言其略，不止一端，开采之始，披沙掘土；欲洗一石，挑至百肩，百肩之泥，尽归沟浚，水道湮塞，蓄泄两难。每逢旱涝，傍山之田，不为蕉叶，即为飘梗，此其害在田禾。既采之后，千百成群，邪许之声，震山沸谷，游民势聚，貽扰乡都，淫酗横生，民难安枕。此其害在民。……士子为之蠹心，闾里为之扼腕，计欲共申，而无法可绝。稍一严之，则游民奸巧，计必捏驾，上司托言公取，或以海塘为名，或以修城为目，捧檄而来，势如虓虎，下吏卑僚，计欲申叩，恐来中阻之，虞任其恣，采逐为莫禁之取。乡愚有口，噤不敢言，以是历年诸职，虑难终禁，于后不得不稍

① [清]黄以周等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徽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宋]杜绾撰、选自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之《云林石谱及其他二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3页。

③ [明]潘伯鹰：《豫园记》，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纵于前。自昔以来，贻害种种，莫可殚述。兹因合邑绅衿、士民呈请详禁，随查诸山，山各有主，所聚石户，止出微租，山值一亩，不上数钱。先将一二宕所（此为采石场所），著令该里买为公业，轮年接管外，其余诸宕，详究申禁，即著本里为公业，轮管办粮。自小民得之，虽同石田，要以除害为收利。<sup>①</sup>

由引文可知，其开采之石料并非一般建筑所需，则是高档建筑材料，以故“欲洗一石，挑至百肩”。而租佃开采者，亦非等闲之辈，没有专门监察机构“三院”的严令，很难加以禁采。对于地方的禁止，他们可以寻找保护伞，巧立名目，以规避之，即“计必捏驾，上司讬言公取，或以海塘为名，或以修城为目，捧檄而来”，这正是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开采所造成的危害深重。因开采之徒“千百成群”由山麓至山顶，大肆采凿，“斤樵斧伐，剥落将尽”，山巅凿为深坑，山峰夷为平陆，既毁了地表的植被，又破坏了地貌的故有结构，加以挑水冲洗石料，从而加剧水土流失，淤塞河塘，使周边农田旱涝无备。同时因遍地砍伐林木等，损害了山地经济的来源，变相地增加了农田税收，亦即“山无定额办粮，亩许侵至十倍”，无疑加剧了乡民的负担。<sup>②</sup>再者，因开山之徒成群结队，往往姿势闹事，亦即“淫酗横生”，扰乱乡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另外，开山毁坟、断山川之地脉，从心理上重创了尊祖坟、信风水的地方官民，此将在后文细论。这一次禁采是在县令与乡绅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然而亦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只能将一二所石厂由乡里买为“公业”，其余再上报宪司申禁，收归乡里为公有。

而孝丰县开采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武康。一次发生于嘉靖年间，另一次在万历年间。因是银矿，以致境内外“亡命之徒，奔走于鹜死”，而百姓一闻开矿，“多弃业逃散”。清光绪《孝丰县志》有载：

《明浙西守道张朝瑞疏》：（孝丰）矿山有二，一名俞岭，一名铜坑。嘉靖三十八年，抚臣胡宗宪，以兵兴尝开采数月，每砂五十斤，煎银不过钱余，得不偿费，富人谢大本等赔累罄如，民情骚然鼎沸。而风闻处州、婺源等处，豪健恶少，趋赴争采，初仅数十人，逾日而百，又逾日而千，蜂湧挖掘，不得利，缺费难归。邑贫悍无赖者，群蚁附之，恣行掳掠，杀死吴毛四等二百余人，因而封禁。

这一次开采，不仅因矿物含银量过低，致使大户人家亏得倾家荡产，同时还酿成了杀戮二百余人的惨剧，由此矿山得以封禁。其后万历年间，因京师乾清、坤宁二宫火灾，为了筹集重修费用，皇帝下令开采天下银矿，孝丰的俞岭、铜坑被列入开采之例。鉴于其间“倭国东窥，兵戍未息；黄河南徙，挽输不进；矿徒潜伺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中原事势已属多虞”，而孝丰又是“盗贼出没，易与为乱”之地，时任浙西守道的张朝瑞力陈开矿之害；而浙江巡抚刘元霖、巡按方元彦也交相谏罢，由此取消了孝丰银矿的开采。然而这一事端给当地百姓也带来不小的影响。志文载道：

今闻孝丰民人，一闻采矿，老幼惊惧，危若山压，不语而同甯，携妇抱子，转徙而他者，络绎道路，号呼彻天，闾阎化为虚室，田亩转为旷土。官府谕之不听，禁之不止，此何景也？<sup>③</sup>

有明一代，湖州境内除武康、孝丰遭受大规模开采之害外，其余也存有不同程度的开采，诸如长兴县西北的鸡笼山、东南之新桥岭，皆发生过开山的祸端，只是在有关县令的严禁下没有蔓延造成大祸。<sup>④</sup>

依据相关文献记载，总体而言，明代湖州境内，因官民爱护家园心切，又能积极合作厉行禁止，以故开采所造成的危害相对为轻。而至清代，开采之祸却越演越烈，亦主要集中于武康县东诸山。从仅

① [清]疏篴等纂修《武康县志》卷二《地域志二·山川上》引（明）知县周宗建《禁石宕文》。

② 明清时期，湖州因商业化的发展，粮食生产入不敷出，往往买粮交租。

③ 参见[清]刘浚等修《孝丰县志》卷四《食货志·土产服食器用之属》“银”条，清光绪三年修、二十九年补刊本，1983年；[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之二十七《征榷考·坑冶》，现代出版社，1986年。

④ 参见[清]赵定邦等修、丁宝书等纂同治《长兴县志》卷十《山》“鸡笼山”、“新桥岭”条，1983年。



见史料来看,其开采之流毒由康熙朝至道光年间,断断续续地肆掠了一百四十余年。康熙年间,就先后出现二次开采之害,前期仍就明朝所开石宕大肆采掘,由山麓至山巅层层开凿。知县冯圣泽《详禁石宕文》即道:

开采之山,近县五里,系东南二乡水口,田禾利害所关。此前知县周宗建为地方申请勒禁,而卑职于开采之始,亦请宪台禁止者也。前朝犹自皮而及骨,今且自骨及心。戕贼既深,祸患愈烈。况乎党众人杂,聚散不常,后事无虞,非所能料。故前此之请命,窃以除害为收利之资,而今日之申详,更以弥乱为致治之本。

本次开采从一开始就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县令以防止动乱为本,及时奏请宪台予以禁止,未酿成大害。然而至康熙五十二年,因修缮淮河下游的高家堰(即今洪泽湖),有官员乘机委任山盱县丞来武康采石。次年,在士绅和县令的呈请下,“奉总河董批停采运”<sup>①</sup>。可见此次开采显然是假公济私之举,因高家堰远在苏北淮河下游,所需石料就近可开。

其后乾隆、嘉庆及道光年间皆有不同程度的开采,尽管县令在地方士绅的配合下积极阻止,然屡禁不止。仅在乾隆一朝,就所见资料来看,先后发生三次开采。第一次在乾隆十一年,佛座、云岫二山存有开采,皆为知县刘守成及时禁止。<sup>②</sup>第二次在乾隆十四年,知县庄纶渭《禁石宕碑文略》有载:

开采诸弊,周忠毅(即周宗建)条晰,各项深切著明,其时不过一宕,浸寻不已,延及七宕。今特约为四禁:一曰:居山诸民,无得贪利租赁;二曰:游民毋得串合潜窝;三曰:毋得借海塘等工料影射;四曰:毋得借桥梁等修造煽诱。

据引文所述,造成开采祸害不断的因素主要为:本地贪利之人,私下租山给人开采;游手好闲之徒,串联境外之人开采;假借修造海塘、桥梁等名目,实施开采。其中后者最难禁止。

第三次开采历时二十余年,所造成的祸害尤剧,不仅导致瘟疫的蔓延,还引发了矿徒聚众劫掠之祸。有史为证:

乾隆二十五年,钦奉谕旨,海宁柴工改建鱼鳞石塘,奉檄采取开凿之际,疾疫丛生,奸盗四起。四十七年,仍即封禁,民气稍苏。

另外,康熙十一年,朝廷下文开武康之铜矿山,“诸生唐靖论止之”;乾隆三十一年,又有奸民请开县西凝紫山,因其俗谓银子山,被德清县令阮芝生阻止。<sup>③</sup>

嘉庆朝也存有开采之风。第一次在嘉庆四年,由石匠串通嘉兴府官吏,骗得开采檄文,前来开采,因得不偿失而停开;次年,海盐修石塘,官府檄文开采,被知县阻止。至嘉庆十六年,又有假借府治建桥之名,“呈府批准”往武康采石,经邑绅与知县的据理力争而罢采。知县龚浚《详止采石文略》有记:

嘉庆十六年,郡西建横渚塘桥,乌程董事呈府批准采石,武邑邑人费树本等,呈请详止。武邑开宕之害,前明周忠毅言之甚悉。从前海塘需石,先后开采三次,实因钦办要工,他若桥梁等工,从未在禁山开采。今郡西横渚塘桥石料,据董事陈焯等称,非武邑无从采办,且所需有限,限以时日,随采随禁,似无妨害。但修桥需石,各县常有,历来不取给武邑。可见不独武邑所有,以不独武邑所有之石,而称非武邑无从采办,此乃宕户串同石工,巧于驾词。以致董事代为声请,假此营利;意不在横渚桥工,势必广招匪匠,远装近载,桥

<sup>①</sup>参见[清]疏篴等纂修《武康县志》卷二《地域志二·山川上》“石狮山”条;知县冯圣泽《详禁石宕文略》;知县史秉直《止采石文略》。

<sup>②</sup>《武康县志》卷二《地域志二·山川上》“佛座山”、“云岫山”条。

<sup>③</sup>参见:《武康县志》卷二《地域志二·山川上》知县庄纶渭《禁石宕碑文略》、知县庆辰《详止采石文》;卷一《地域志一·邑纪》。

工足用,欲罢不能。即使遵饬封禁,而宕户唯利是营,探有他邑桥工,又必声请开采,既有修桥弛禁之案,未便岐而为二,几使狮、塔二山终无封禁之日,惟有仰恳宪恩,飭董事另行采办。<sup>①</sup>

由引文可见,此次府治建桥采石于武康,显然是荒诞之举,因湖州府城西,诸山林立,何况卞山还出产奇巧优质石料,何必远去武康开采?嗣后,仍有开采之嫌,因道光二年就有一次严厉禁采的举措:

道光二年,奉巡抚帅批,照旧案永远封禁。嗣后无许擅行开采,碑立县署大堂。<sup>②</sup>

另外,清后期湖州府还发生了因棚民租佃山地、开垦种植苞谷,造成水土流失、淤塞水利之害,尤其是在东、西苕溪上游的开垦。东、西苕溪皆发源于天目山系,主要为杭州西部及湖州西南地。清代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有载:杭嘉湖三郡之地,“以杭为最高;他如孝丰、安吉、武康三县,则居湖郡之高者;……长兴之西南境,乌程之西境,则又各居本县之高者。虽其流之远近不同,而要皆水之所自出。”然“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刨松,一遇淫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辄有泛滥之虞。”<sup>③</sup>故此,地方乡民与官吏颇为重视,并通过禁止和因循利导的方法,变害为利地渐次加以解决。王氏在其著序中对此亦有记述:“惟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泄,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然棚民安土重迁,驱之则不胜驱;不驱则为害日甚。或今改种茶果、竹树,以坚其土,并严切晓谕山主,勿再租与后来者,庶免阻害水利。是在贤有司善教之。”

可见官府既重视开垦所带来的危害,又能体察和同情客民生活之艰难,并非简单采取盲目驱赶的措施,而是统筹兼顾地采取禁止与改种的方法,既可保护环境,又能安置棚民。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湖州境内发生一系列祸害乡里的开采,除极少数缘于修建关系国计民生工程所需,绝大多数是为谋取私利而非法进行。这些矿主为了规避禁采,往往私通官员,以修建公益工程之名,巧取檄文,请托开采。然而自始至终,地方县令与绅士都不遗余力地去阻止,对开采祸害的蔓延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尤其是这些县官,无一例存有与矿主私通并暗中助其开采的不法行为,他们既非本乡之人,还要顶着有关上司请托的压力,却又能坚持不二地积极向上呈请,厉行禁采。他们为何都能表现出如此难能可贵的品行?

### 三、风俗信仰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葛剑雄先生曾对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即:“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当广泛的自由,因为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远远没有达到极限,丰富多采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sup>④</sup>其实,历史文化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同样重要,明清时期,在保护湖州环境方面,历史文化,更确切地说风俗信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在各自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与禁忌,并且历代相传,笃信不疑。所谓风俗,即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禁忌即是在一些特定的文化或是在生活起居中被禁止的行为和思想,在范畴上,后者实际包容于前者。

①参见:《武康县志》卷二《地域志二·山川上》知县庆辰《详止采石文》、知县龚浚《详止采石文略》。

②《武康县志》卷二《地域志二·山川上》知县庆辰《详止采石文》。

③[清]王凤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备考》之《杭嘉湖三府水道总说》,据道光四年修、光绪四年重刊本影印,1983年。

④葛剑雄:《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而对这二者的信奉,即是一种信仰。至于信仰的哲学诠释,非本文所探讨,勿再赘述。可见风俗、禁忌与信仰对人们的生活与生产行为具有很大支配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中国人民对山水的崇拜源远流长,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以山水比拟人的美德,即今人们所乐道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人志士甚至将崇拜山水上升到热爱国家的高度,以致在中华民族受到外敌入侵之际,往往用“山河破碎”以示痛心。而今我们表示热爱祖国,又以“爱我河山”相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隋代开始,以科举取士,官吏有较高文化素养,对山水尤为崇拜。在他们心目中,“凡名山大川,能兴云雨,以利万物,草木、禽兽、鱼鳖、货财咸于是乎取资。撙节爱养之,不可胜食用也。若夫,民生恃为保障;人文赖以钟毓,则安危盛衰之故,实攸系焉。”<sup>①</sup>以故对“山川地脉”之说,他们信奉不疑:凡有破坏,不仅人才衰竭,还殃及百姓的生命。对祖坟的禁忌,亦复如此。在科学上,尽管二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这一信念对上文所述的有关县令厉行禁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民生的关爱。

诸如:万历年间,县令周宗建的禁采,对此即是很好的反映。其在《禁石宕文》中即道:

计将采凿,相定山形,荒坟古垒,悉遭洗荡。冷灶虚烟,尽为埋没。夫国家有义塚之设,棲托游魂,而奸民乃以网利之贪,殃及墓鬼,此其害在枯骨。山川地脉,生气似关,开采以来,龙伤脉断,傍山两都,文物凋穷,书声久绝,死丧相续,烟火荒凉,小民无依,卜诸术家指点,厥咎皆因山口。此其害在民生。连年剥取,一望凋残,山灵荼毒,无所凭依,兼之山属东南,地形居巽,在于学宫,犹为亲逼,据其斩剥,气脉何存?将使一邑士民阴遭害蠹,从来胜迹荡为飞尘。此其害在阖邑。

其后历次禁采多以破坏地脉作为关键理由。

不仅乡民士绅因信风水,力保山河免遭毁坏;而且地方官吏也笃信不疑,担心风水被坏,生灵涂炭,人才不兴,而极尽全力地加以禁止。这样的事例并非个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较为普遍的。我们知道湖州水乡居多,鱼类丰富,可是明清时期,因气候变寒,以及保鲜技术的创新,捕鱼销售有利可图,以致出现灭绝性的毒杀。信仰文化对禁止这一破坏生态行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从清代宣统三年德清县所飭禁药鱼碑文,即可观其大端。《勒石永禁药鱼碑》:

知县张为给示勒石永禁,事据绅士徐本衡、施涵、徐肇基、徐士骏、许德修、沈光裕等稟称,窃德邑地处水乡,交冬以后,乡民皆以糠粃食饵,纷投浣滨,引鱼萃聚,旋将兜口用芦席拦住,复用巴豆敲碎煮水,抛入兜中,在水之物,尽行毙浮水面,俗谓之火烧河底。其中鱼类以及螺蛳、虾蟹,无一得生,毒害物命莫此为甚,甚且四乡皆有此恶习,惟河墩桥北圩村为最盛。每年至腊月间,无论大小各户,均以药鱼售钱为度岁之资,河中物命被毒害者,不知几千万?叩请给示勒石永禁。等情到县,据此,查北圩村四乡等处,向有毒鱼恶习。先经本县访闻,正在示禁间,据稟前情,除批示外,合行给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阖邑四乡居民渔户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制药毒鱼,残害物命,殊干天地之和。会看北圩村等处,惨遭风灾,烟户荡然,不必显言,报施恰宜,力加修省,各勤正业,何忧度岁之无资?暗毒潜鳞,卒为戾气之所酿。自示以后,务各爱惜生命,勉为良善,倘敢故违,一经觉察,或被告发,定即提案严究,决不宽贷,其各凛遵毋违,特示。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给。<sup>②</sup>

从引文中所谓“火烧河底”的剧毒描述,不难明了该捕鱼的方式可谓是不计后果的绝杀。然而乡民士绅把这一毒害生灵事宜与北圩乡的风灾相联系,认为后者的结果是乡民滥杀所致,力加禁止。而

① [清]刘浚等修《孝丰县志》卷一《方輿志·山水》,据光绪三年修、二十九年补刊本影印,1983年3月。

② [民国]吴霭皋等修、程森纂《新德清县志》卷十《艺文志一·碑刻》,民国二十年修,1970年。

且县官亦复如此。

另据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记述,湖州在明代黑鱼(术名乌鳢)尤多,根本原因乃是宋代的一则信佛故事的流传,导致湖民禁忌捕食。其文道:

乌鳢极多产,湖人少食者。《葆光集》载:“霅人渔者,将簞篮捕鱼,往收之际,见一鳢,长数尺,枕簞上,将铁叉射之,不中,看簞内有小鳢渔者,知其子也。隐候之良久,复至,求出其子渔者,悟而祝云:若有变示,当放尔子。其鱼乃吐黄气一条,上有一僧,长数寸,其气高二丈余,顷乃没。渔者骇而放之,因弃业于金山寺为僧。”湖人好传其事,故鲜食者。夫蠢动含灵皆有佛性,渔人一念,佛心已生,其所感亦机悟也。<sup>①</sup>

综上所述,我们清晰可见风俗信仰文化对环境保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这些信仰的因果关系,从今天自然科学来看并无直接的因果性,但却隐含了人与自然相生相克的科学道理。正是这一理念使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县官与士绅崇拜山水、敬畏自然,并以撙节爱养的态度善待自然;加以他们又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对当地环境保护发挥了应有作用。今天同样存有这些风俗禁忌,如果我们能有针对性地因势利导,不仅可以破除糟粕迷信的危害,亦能推陈出新地加以健康利用,不失为保护环境的良策。就本文所考察的情况来看,有关县官之所以自始至终极尽所能地去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还在于他们有一颗关爱民生之心。

(责任编辑:王永贵)

## Measures Containing Mining Damage in Huzhou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ffect of Customs and Belief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IAN Ke-jin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zhou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suffered from a series of damage inflicted by mining activities, which were usually done under the guise of such justifiable causes as building seawalls and bridges and minting. Despite various pressure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some visionary men, the local officials in Huzhou prohibited the harmful mining business, thus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that time. An analysis of the text of relevant sanctions issued and measures taken by the then local government shows that the local officials tried to protect environment mainly because they not only respected the customs and beliefs but paid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 as well.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imilar customs and beliefs. If we make a wise use of these customs and beliefs by filtering out their negative superstitious elements, they can supply us with a lot of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zhou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mining damag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①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产类》,嘉业堂本,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藏。